

试论毛泽东引兵井冈

马列主义教研室 宋俊生

摘 要

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引兵井冈这一举动,有其自觉的、必然的成份;也有不自觉、被迫的一面。只看到一方面,必然犯偏颇之病。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危急关头,表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卓越才能,他把自己思想上自觉的、必然的成份,巧妙地与在实际中遇到的那些不自觉、被迫的因素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将工农革命军一步一步引导到了井冈山。

毛泽东引兵井冈,不论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还是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历史地位的确立,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关键的一步。

毛泽东引兵井冈,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在建国初期,已有论述。大概是认为“逼上梁山”基调太低,有碍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于是,毛泽东引兵井冈是“既定的战略部署”便应运而生。

“文革”期间,这种“既定”的拔高观点发展到了顶峰,宣传毛泽东同志在上井冈山之前,已走遍了罗霄山脉,认定井冈山为最理想的地方。甚至有人认为,在秋收起义准备阶段的安源会议上,毛泽东已决定了要去井冈山。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那股否定毛泽东的思潮中,似乎有人认为,上井冈山之前,毛泽东对井冈山地区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到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完全是被迫的,对毛泽东落脚井冈的必然成份注意不够。

笔者认为,两个极端的宣传都不好,应把两者结合起来,正反合,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本文将从这两方面的结合上作一些探索。

一、毛泽东引兵井冈山的思想基础

笔者认为,毛泽东引兵井冈,是有比较深厚的思想基础的,为此,谈以下几点:

本文于1985年5月11日收到

1、毛泽东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是他引兵井冈落脚农村的最深厚的思想根基。

在大革命时期，我们党过份依赖国民党，想以国民党的名义，通过国民党的力量来完成**任务**。毛泽东较早地抛弃了国民党的旗号，提出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进行革命。所谓独立自主，就是用人民自己的力量来进行革命斗争。不依靠国民党，是否可以依靠外国的帮助，八七会议后，他批评了湖南一部分人，想搞一个师，与“叶贺”部队共同取广东的计划。毛泽东认为，即使湘南暴动失败了，也不要再去广东，而就地发动湖南人民开展斗争。他批评了某些人只看到广东，而忽视了湖南的错误思想。

在当时，虽然还没有“独立自主”这一提法，但在斗争中，毛泽东这方面的思想确已树立，即挽救中国革命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由于他有了这么一个根本思想作指导，为根基，所以，走到井冈一带，便落脚生根，就是必然的了。

2、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是他引兵井冈最基本的思想基础。

当然，在大革命时期，党的其他领袖，对农民问题，也有过精彩的论述，但是，毛泽东与之相比，更是鞭辟入里。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里，关于农民问题在整个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两段十分深刻的论述。他说：“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讲得很清楚，农民起来革命，打翻封建势力，乃是铲除“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是推翻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这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和基本任务。

毛泽东还说：现在“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这就是说，解决农民问题，是补救中国革命的前途，完成中国革命任务的基本条件。

毛泽东上述两段文字的基本思想，即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农民问题的解决是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这两方面的思想，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发展的更明确了。

既然毛泽东已经深刻了解到农民问题乃是中国革命的“真正目标”，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良方，那么，当大革命已经失败，当他独立领导一个地区的革命时，他来到山区，落脚井冈，解决农民问题，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在“五大”之前，毛泽东主持的全国农民协会曾决议彻底解决农民问题——实行土地革命，但被右倾机会主义者所否定。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的农民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①

在准备秋收起义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要“全部抓住农民”的响亮口号。

总之，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作用的论述，是他后来引兵井冈，在农村搞革命的思想基础。引兵井冈，到农村搞革命，是他关于农民问题一系列科学论述的实践，是实现自己诺言的伟大试验。

3、毛泽东提出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的纲领，是毛泽东引兵井冈的直接思想基础。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那些深邃论述，因为受到种种限制，不可能实现。在他提出挽救中国革命的秋收起义纲领中，不但坚持了原来的思想，即没收地主土地的原则，还指出，没收地主土地，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必须搞武装斗争，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权，这些思想组成一个统一体，即是中国革命的党、政、军、民（土地革命）等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这也就是秋收暴动纲领的要点。

纲领内容的党、政、军、民的统一体，正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萌芽，井冈山的斗争，就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斗争。难道这个“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萌芽的纲领与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实践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吗？

笔者认为，毛泽东为秋收起义制定的那个纲领，是他引兵井冈，落脚农村，从事“工农武装割据”伟大斗争的直接的、思想基础。

4、引兵井冈是毛泽东上山思想的落实。上山是毛泽东一贯的主张，即：他主张，当革命力量在大城市呆不住，或当进城不行的时候，便上山。如何上山，那要看条件的具体发展与变化。所以，当秋收起义部队受挫折，其他地方去不成之时，落脚井冈，便成为他原来上山思想水到渠成的结果了。

5、毛泽东对湘赣边界井冈山一带的情况，早就有所了解。当然，认为在落脚井冈山之前，毛泽东已“走遍了罗霄山脉”，并认为，这是毛泽东落脚井冈唯一的全部思想基础，这种看法没有充分的根据。实际情况是：毛泽东在落脚井冈之前，对井冈山一带的情况有所了解，这是他落脚井冈山的思想基础之一，对此，我们谈以下三点：

第一、中共江西省委与毛泽东引兵井冈。

（1）老同志的回忆：

宋任穷一九六一年的一段回忆说：“当我军先锋部队进涂家埠车站，发现车站内外，车上下到处都是国民党军队，于当晚立即离开涂家埠，向西转移，准备绕道奉新、高安、上高，同南昌部队取得联系，并与他们会合，不料，到达上高后，得知南昌部队已远离南昌南下了，我已暂时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系和会合，后经靖安、奉新到了高安，在高安开了一个会，由于部队没有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虽然中共江西省委曾经指示过到莲花厅，但到莲花厅如何搞法也不清楚），大家都很苦闷，部队如何行动的问题作为讨论中心……，一人一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会议最后确定向湖南江西交界的铜鼓县转移。”（着重号是笔者加的）

宋任穷一九七五年回忆：“浏阳县委派我随江西省委一同志赴南昌，向江西省委请示，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接待我，并交给我一封信，并说宁冈有几十支枪，是我党领导的，其余的事信上已经写了（信的内容我不知道），并交给我几块银洋，我不想带那么多。我在回铜鼓途中，听说铜鼓的部队已沿湘赣边界南下了。还在我从铜鼓去南昌时，组织上就交待我，说你回来时，可到铜鼓与莲花之间去找部队（当时作这种预算可能是想去广东），后来我在江西省委散发传单的头一天离开南昌，在什么陈家坊一带找到了部队，同志们告诉我，现在是由毛委员领导，于是我把信和一些银洋（剩下的）交给了毛委员。”②（着重号是笔者加的）

张启龙同志也多次作过同样内容的回忆。

（2）历史文献的记载：

江西省委的文件印证了宋任穷、张启龙的回忆。一九二七年九月，江西省计划全省暴动时，把宁冈、莲花等县看成为“农军有相当力量的县分”。全文如下：“在农军有相当力量的县分，如宁冈、安福、莲花等县须设法秘密集中，实力收缴政府及所谓各种反动武装，驱逐或捕杀反动官吏，解散或捕杀反动的国民党的伪农协及其他反动团体。”^③

省委在这个文件里，是把修水、铜鼓看做是“农军势力统治的县分”，总之，省委对各县农军势力的情况，还是非常了解的。省委文件讲的莲花、宁冈的情况与张、宋回忆一致。

第二、中共湘南特委与毛泽东引兵井冈。

根据张琼的回忆，可看出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初到湘南，湘南特委委员李少山、黄庆云曾经向毛泽东介绍了湘赣边界大小五井山区（井冈山）的情况，当时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指示并湘南特委：如果情况不好，你们就到横山县北乡庙溪。我到江西，带上安源一带的武装，到那个大山上（指大小五井）。一九七四年我本人曾专访了张琼，张老仍然是那个看法，并补充了以下的新情况：他们湘南特委在大革命失败后，是上了庙溪，坚持斗争，但庙溪通往井冈山这方面的道路被敌人封锁了，所以就没有去井冈山。她还说，一九五〇年，她到北京，代表上海市教育工会请毛泽东提词，毛泽东在与她话旧时，还问她，当时为何不去井冈山（大小五井），张琼解释说，因为路不通。

根据张琼的回忆，可看出毛泽东对罗霄山脉中段大小五井山区的情况是早就有一定了解的。

第三、安福农民武装与毛泽东引兵井冈。

毛泽东在未达到井冈山地区之前，对井冈山一带情况的了解，还可能有几条渠道：

（1）毛泽东在建党前前后后。曾多次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而安源与南部的莲花县只有一山之隔，莲花县党的组织与安源、萍乡党组织的关系是较密切的。毛泽东通过安源党组织可能早就对罗霄山脉中段莲花、宁冈一带的情况有所了解。

（2）秋收起义部队第二团，有一部分战士，来自永新、莲花。他们可能把莲花、永新、宁冈的情况带到秋收起义部队中。

（3）第三团团长王兴亚率领的安福农军，曾与袁文才、王佐的武装，与贺敏学等率领的永新农民武装一起组织过永新暴动，攻打过永新城。后来，王兴亚率队到安源后，曾多次与贺敏学书信联络。根据文献记载，在安源会议上，潘心源等同志将部队情况作了汇报，当然王兴亚也可能将他们部队与井冈山袁文才、王佐部队活动情况向毛泽东汇报。

当年负责安源党与王兴亚部队联络的人金洪启回忆说：“阴历六月底，安源党组织又叫我送信到安福去，叫萍乡农民和安福农军到安源来。……，袁、王曾请王兴亚带队伍上井冈山，王兴亚说：‘我不能去，我是属安源党组织指挥的’，……。我在路上把安源党组织的信交给了蔡苏明、王兴亚他们，他们就带着队伍往安源来了。”“我们到安源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在安源召开了安源会议，部署秋收起义。”^④

总之，毛泽东在未到井冈山之前，对井冈山地区的情况，通过不同的渠道，是有所了解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引兵井冈落脚农村进行革命是有深刻思想基础的，是有必然性的。

二、毛泽东引兵井冈也是被逼迫出来的

毛泽东曾说：“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⑤所以，毛

泽东曾说，引兵井冈是“逼上梁山”，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毛泽东引兵井冈也有被迫性的一面。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罗霄山脉北段受挫折后，只有向南走的一条路了。

九月十一日、九月十四日、九月十七日，工农革命军的三个团先后在湘东遭到军事上的失败。当时湘东，敌军大约有两个师的兵力。他们在十八日发布命令，计划在十九日对工农革命军发动所谓“总攻”。在这种形势下，不但割据湘东是不行的，就是在湘东久留也是不可能的。

部队向西发展的可能性不存在，向东发展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出走，敌人占领了南昌，江西军阀朱培德正派军队向西进击，“第三军第八师取道袁州，向萍乡方向堵截。”^⑥以配合湖南敌人，消灭秋收起义部队。

部队向北发展的可能性也不存在。武汉的革命势力呆不下去了。警卫团从武汉退出，正说明了这一点。鄂南农村也不行。以叶重开为首的鄂南几县农军，在当地呆不住，来到修水桃树港驻扎的事实，正说明鄂南农村被敌人占领，我们的革命势力去哪里也不行。

由此看来，我们向东、向西、向北发展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又打了败仗，特别是芦溪一役，损失更大。打了败仗，城市进不了，其他地方也去不成，形势所迫，只有南进一条路了，而井冈山正是在南进的必经之路上。

毛泽东原来打算“上山”，也是讲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上山”，现在“万不得已”的情况已经出现，毛泽东决定“上山”。

也正如敌伪资料所说：“赣军亦达到铜鼓，余已陷身重围之中，除匿深山大泽之中外决无活动余地。”^⑦

总之，形势发展的险恶性，迫使秋收起义部队只有走上山的路，走落脚井冈山之路。

三、毛泽东把自觉性与被迫性巧妙结合起来

从上面的分析，很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引兵井冈，既有一定的必然性，又有一定的被迫性。历史的发展，总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面，又有主观创造推动历史的一面。当然，影响历史进程的还有很多因素，历史发展的结果，总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使然，即历史发展的“合力论”。那么，毛泽东是如何把自觉性与被迫性结合起来的呢？

毛泽东以原来的思想认识为基础，清醒地面对现实，将马列主义理论，将党的原则指示，与斗争实践相结合，一步一步地前进，他是自觉地，又是被迫地引兵井冈。他非常巧妙地将自觉性与被迫性结合了起来。现将毛泽东大革命失败后回湖南，到走上井冈山这一历史过程，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第一步，毅然返湘，计划搞湘南暴动。

毛泽东始终认为湖南是革命基础最深厚的地方，是最有希望的地方。所以，他要求回湖南工作，开展斗争，挽救革命。“马日事变”后，他回到了湖南，敌人企图把他当反革命处置，阴谋逮捕他。陈独秀又批评他，不叫他在湖南。所以，毛泽东当了十天省委书记后，又奉调回武汉，经过他力争，和蔡和森等同志的支持，他拒绝去其他省份，经过中央的批准，他又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再返湖南。

这次返湘，不仅是他力争的结果，而且，也是湖南人民湖南省委强烈要求的结果。湖

南省委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给中央的信说：“润（毛泽东）赴汉未返，各部无一强健者。而工作无部不十分吃紧，最切要加劲的是省秘和组织两者，惟盼润速返驾，力企整饬。……。现维僵局，渡日如年，深恐获咎莫释，应如何调度之处，恳请明示”。同一天，《中共湖南省委给润、梦兄信——省委最近工作及各部负责人的名单请示》里再次表示希望毛泽东回湘之意，说：“以子任（毛泽东）来任军事工作甚好，如子任不任书记，即请另令其改任军事，然书记仍恳另派也。”

正因为自己的要求，湖南的恳求，毛泽东才能返湘。毛泽东此次回湘，根据实际情况，准备搞湘南暴动。湘南暴动计划经中央批准，毛泽东派人赴湘南准备。当时衡阳特委书记陈佑魁、郴县特委书记夏明震等，均在湘南一带活动。陈佑魁爱人龙淑的回忆及张琼的回忆均证实了这一点。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不求个人安宁，而力争回湘，这是他走上正确道路迈出的关键的第一步。因为当时的形势还比较好，大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群众斗争，其火焰还未完全冷下来，他仍然想依靠群众的力量，在湖南发动后，引起全省的暴动，挽救革命，所以这时还不可能最后定下上山的决心。但是，这一步却解决了依靠力量的问题。他置身在革命最有基础的南方，又来到了南方几省农民最发达的湖南农民中间，他终于找到了挽救中国革命力量的源泉，依靠广大的中国人民，尤其是依靠广大农民。

第二步，确定湘中计划，组织湘赣边界暴动。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驻扎在湖南汝城一带的农军，被敌人围攻而失败。这样，在湘南组织暴动的条件已不可能。毛泽东便不得不放弃了湘南暴动计划，极力主张在湘中暴动。但是，制造湘中暴动的部队都集中在湘东赣西一带。所以，毛泽东不得不奔走在湘东赣西广大农村，组织军队，领导暴动。这是他为走上正确道路又迈出了扎实的第二步。这一步比前一步大大前进了。这一步主要解决了如下三个问题：（1）他平生第一次真正抓到了一支军队。中央任命他为“湖南工农军总部负责人”，省委又任命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但这都是空头衔，当他来到前方，到了军队中，才平生第一次真正抓到了一支军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2）他置身在农业地区，群众之中；（3）他置身到湘赣交界的广大山区。因为这时部队在军事上还没有失败，在修、铜一带还有驻扎的可能，所以，他仍然不可能下最后决心上山。但是，已经为上山打下了更好的基础。

第三步，向南转移，寻找革命的落脚点。

湘赣秋收暴动的部队，第一军事目标是打长沙。当第一团与第三团先后遭到挫败，打长的计划实现不了时，毛泽东才不得不改变计划。九月十四日，在上坪召开会议，毛泽东果断决定不打长沙，向南撤退。当时，虽然还没有决定到农村去，更谈不上到农村建立根据地，但放弃了打长沙的计划。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上坪会议后，毛泽东向干部做思想工作，让大家都理解他不打长沙的建议。在这过程中，主要是做师长余洒度的工作。经过多次反复的讨论，最后，在九月十九日夜召开的文家市前委会议上，通过决议，不打长沙，向南撤退。

从上坪会议到文家市会议，这是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这一步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1）向南进，井冈山正是在向南进的路上，这为最后落脚井冈，造成客观条件；（2）形势逼迫他们，提出到何处落脚的问题。原来想打长沙，长沙去不了，北段呆不住，那么，到何处落脚呢？人们开始思索这一问题，这在客观上为落脚井冈准备了条件。

第四，茅坪安家，落脚井冈。

毛泽东率领部队，向南转移。不料，在芦溪遭受重大挫折。部队减员很大，战士思想为失败情绪笼罩。当九月底到达三湾时，由于主观的需要与客观的可能，毛泽东不得不对部队进行了训练与整顿。前委在三湾开会，紧接着又在古城开会。三湾会议、古城会议决定在井冈山一带落脚，这是毛泽东走上“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最关键的一步。这一步至关重要的一点即是工农革命军在农村不走了，就地生根，建立根据地，进行革命斗争，在茅坪建立后方医院与后方留守处。从此以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即在此进行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总之，毛泽东是把主动性与被动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一步一步走上井冈山，正如李维汉所说，毛泽东是“被迫地却是机智地上了井冈山”。

四、学习毛泽东的优秀品质

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在茅坪安家，落脚井冈，就立即开辟了伟大斗争的新局面。毛泽东坚决按这条道路走下去，终于摸索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引兵井冈，和紧接着的井冈山的斗争，是堪成我党第一次战略转变中的典型与代表。

在中国革命这个战略转变中，毛泽东所以能代表正确方向，较早地走上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与他个人的努力与优秀品质是分不开的。

第一，毛泽东很了解中国实际，特别深知中国社会最大的农民问题。毛泽东担任过中央的农委书记，指导过全党的农民运动，作了大量的农村调查。

正因为他深知中国社会，所以他能写出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不朽名篇。客观形势要求马列主义者写半殖民地半封建论，毛泽东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各阶级乃至各阶级里的各阶层，从政治、到经济，再到革命态度，从横的，到纵的，作了深入的剖析，给以深刻的论述。

毛泽东同志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秋收起义的过程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第二，毛泽东那种挺身到斗争第一线的实干精神，是支持他走上正确革命道路的第二个重要品格。在革命危机关头，他不去外国，而留在到处是白色恐怖的国内。他不去四川或其他地区，而挺身到斗争最艰苦的湖南。到长沙还不行，他一直战斗在湘赣边界斗争的第一线。他从武汉中央的领导岗位，来到湖南，一直走到暴动的士兵群众中。他担任了斗争第一线的实际职务——前委书记。他亲手制定了纲领、他亲手制定了暴动计划、他亲自创建了军队、他亲自带领部队向敌人进攻。

他与那些有经验的第一线的同志相结合，时刻掌握斗争实际的发展状况，时刻倾听基层群众的呼声，这就为他将马列主义，将党的方针政策与湘赣斗争实际相结合，提供了极为有力的条件。

第三，毛泽东同志在革命的转变当中，那种不怕苦、不怕流血牺牲的战斗精神，是他的重要品格的另一点。“马日事变”后，他回湘，被特务盯上，但是，他机智地脱险了，在长沙，敌人阴谋逮捕他，他亦不怕。在从安源去铜鼓的路上，他被敌人逮捕了，但终于脱险归来。

毛泽东不仅具备了不怕牺牲的大无畏战斗精神，而且，他还具备了马列主义大师所具有的那种理论上的勇气。如果他安于马列如何说他就如何办，如果安于中央如何指示就如何搞，那么秋收起义一系列新的特点，新的面貌，便不可能出现，根本不可能引兵井冈，根本不可能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穷钻山沟的奇事。他善于将丰富的尖锐的斗争实际中的问题，不断总结提高，以发展马列主义理论，以丰富中央、省委、以及自己以前的想法。这种探索的作风，进取的精神，理论上的勇气，正是他坚持斗争，最终走上井冈，走上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的思想前提。

第四，毛泽东那种战略的眼光，正是他能克服一个个困难，使自己走上正确道路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身在穷山沟，但眼光总是看到党的整体利益。他时刻想到的是全国革命的形势与湘鄂赣三省斗争以及中国革命的未来。正象毛泽东自己所说的那样，没有一个全局在胸，是很难下一着好棋的。

第五，毛泽东那种在艰苦情况下，相信未来，充满信心的品质更是十分可贵的。他刚刚引兵井冈时，确实感到潮流的低落，他自己也感到寂寞。他当时经常爱念宋朝诗人陈与义的一首词：

临 江 仙

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
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尽管他感到寂寞，但不悲观，“希望到全国沸腾的革命高潮中去”，他激励着战士，团结战斗在井冈山上。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以诗文一样火热的句子，渴望沸腾的革命高潮早日到来。这些句子虽然流露了急躁情绪，但是，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

正因为毛泽东具有这许多品质，所以，他能率领起义部队引兵井冈，较早地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注 释

- ①毛泽东：《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这是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发言记录稿的一部分），选自解放军战士出版社《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三页。
- ②《访宋任穷同志记录》，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宋斐夫、陈葛初访问。
- ③《江西省委对于秋暴的计划》，一九二七年九月。
- ④金洪启：《我和安福农军》，安福纪念馆刘传政，李昌学整理。
- ⑤毛泽东：《我们的一些经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 ⑥《湘东最近防共与剿》，选自《汉口民国日事》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 ⑦《省湘防军事告一结束》，选自《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